

胡適作品集 34

胡適留學日記(一)



胡適



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

胡適作品集
34

胡適
留學
日記
(一)

胡適作品集③

胡適留學日記 (一)

作者／胡適

*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者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 (代表號)

總經銷／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

郵撥／0103854-0 電話／306-6842

法律顧問／

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／(05)227-3193

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／721-9391

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8樓2室 電話／394-3393

內文印刷／

優文印刷廠・臺北市汕頭街54巷42弄55號 電話／306-3473

封面印製／

萬興印刷製版公司・中市景新街140-4號1樓 電話／249-1836

1986年6月25日 遠流一版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售價100元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香港出版者／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.K.\$25.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香港總經銷／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／5-293283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胡適初讀莎士比亞

胡適於一九一一年二月初識莎士比亞，數月之內勤讀莎劇多種，植下因緣；十九年後，胡適任事於庚款委員會的翻譯委員會，積極發動莎劇中譯的工作。終於由梁實秋先生以卅年之功譯完全集。





胡適出國留學前的模樣

這是胡適出國留學前幾天拍的
照片，時間是宣統二年(1910)，他還
不滿十九歲，頭上還留著辮子。

庚款留美第二批學員

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考試，第二屆(1910)錄取了七十名，
胡適(左起第三排第一人)考了第五十五名，語言學家趙元任
(右起第四排頭上有箭頭者)考了第二名。他們後來成為知交。



米勒名畫「拾穗圖」

法國畫家米勒(Jean F. Millet, 1814~1875, 胡適譯米耐)的「拾穗圖」，是描寫貧民田舍的名畫。胡適在日記中割記此畫，並附圖印證，自認為是中國割記中之創舉。(見民國三年七月五日條)



庚款留美第二批學員

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考試，第二屆(1910)錄取了七十名，
胡適(左起第三排第一人)考了第五十五名，語言學家趙元任
(右起第四排頭上有箭頭者)考了第二名。他們後來成為知交。



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出版前言

王榮文

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，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「價值重估」(Transvaluation of values)工作；也就是說，在胡先生「恩怨將盡之時」，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，就胡適論胡適，「還他一個本來面目」的時候。

近幾年，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，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。例如：唐德剛先生著、譯的《胡適雜憶》、《胡適口述自傳》二書，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；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已經出版了；余英時先生的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也開啓了「爲胡適定位」的有意義的討論。即使在海峽對岸，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「熱鬧」早已退散了。這幾年，他們重新整理出版《胡適的日記》、《胡適書信集》，並編纂《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》，這些行動，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。

另一方面，胡適之先生的「俗世聲名」正迅速地沉澱，他自己的確是已從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「歷史命題」。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，卻也有益於「胡適定位」的討

論；新起的研究者，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。余英時先生在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文中就說：「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，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『譽』或『謗』的傾向。」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。

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「歷史命題」，「重新看胡適」就變得可能了。

遠流版的《胡適作品集》，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。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，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，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，希望有助於《胡適全集》的早日出版。

《胡適作品集》的新版發行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「實用的」現代意義。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「明白曉暢」，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。他在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」一文中說：「我要教人疑而後信，考而後信，有充分證據而後信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，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，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。」

「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」，即使在今天，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，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。

最後，我們對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得以印行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，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。

胡適留學日記臺北版自記

胡適

這幾十萬字的日記，最初用「藏暉室劄記」的標題，由亞東圖書館出版；後來改稱「胡適留學日記」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現在仍用「胡適留學日記」的標題，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我藉這個機會，改正這裏面幾個錯誤：

一、頁七九七，「讀《集說詮真》」一條。《集說詮真》的作者是天主教司鐸黃伯祿斐默氏，我當年錯認他是一個外國人，故說，「又以其出於外人之手也，故記以褒之。」黃伯祿是江蘇海門人，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天主教神父，他的著作很多。方豪先生去年曾指出我這個錯誤，我很感謝他的指示。

二、頁七九九——八〇〇「印書原始」一條。依現在的知識看來，此條錯誤不少，例如其中引《事物原會》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「廢像遺經，悉命雕板。」末四字當作「悉令雕撰。」又如其中說「宋仁宗慶曆中，有布衣范昇者，爲活字板」，范昇當作畢

昇。畢昇的活字，詳見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。

三、頁八〇四，第十行：「至於唐人之繁而無當（邢昺以百八十四字註「學而第一」四字，孔穎達以千

六百四十字注「俟我於蒼乎而」三語）」。

邢昺是宋太宗眞宗時人，他的《論語正義》是咸平二年（西曆九九九）奉詔撰定的。所以

「唐人之繁而無當」應該改作「唐宋人諸經疏之繁而無當」。

這幾條錯誤都在七頁之內。其他錯誤想必還不少，倘蒙讀者隨時指示，我很感謝。

民國四十六年除夕，在紐約記。

1 參見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第三十六冊《胡適留學日記》第二〇七頁。

2 參見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第三十六冊《胡適留學日記》第二〇八頁。

3 參見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第三十六冊《胡適留學日記》第二一三頁。

重印自序

這十七卷《留學日記》，原來題作《藏暉室劄記》，民國二十八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曾排印發行，有民國二十五年我寫的自序，說明這七年的日記保存和付印的經過。這書出版的時候，中國沿海沿江的大都會都已淪陷了，在淪陷的地域裏我的書都成了絕對禁賣的書。珍珠港事件之後，內地的交通完全斷絕了，這部日記更無法流通了。

去年我回國之後，有些朋友勸我重印這部書。後來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，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。這件事現在辦好了，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。

我向來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，某某室，某某齋做書名的舊習慣，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《胡適文存》《胡適論學近著》。這個法子可以節省別人的腦力，也可以免除後人考訂「室名」「齋名」的麻煩。「藏暉室」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約自己的一個室名。在日記第十一卷的開始，我曾說：「此冊以後，吾劄記皆名『胡適劄記』，不復仍舊名矣。」民國初年，我的朋友許怡蓀

摘鈔我的日記在《新青年雜誌》上發表，曾用「藏暉室劄記」的標題。後來我允許亞東圖書館印行全部日記的時候，因為紀念一個死友的情感關係，我就沿用了《藏暉室劄記》的名目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頗懊悔這件太牽就舊習慣的舉動，所以我現在決定改用《胡適留學日記》的標題。

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這幾十萬字，用力很勤苦，錯誤很少。今年我曾自己校對一遍，又改正了一些小錯誤。

去平與同國之對，其理則支離。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十一月八日，胡適記於北平東廠胡同一號。

自序

這十七卷割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一七）的日記和雜記。我在美國住了七年，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，或日記遺失了。這裏印出的割記只是五年的記錄：

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，有日記，遺失了。

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，有簡單日記。（卷一）*oblivious impressions*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，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（名為北田 Northfield 日記），

第一天遺失了。

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，有日記。（卷二）

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，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割記（卷三的首二頁），其餘全闕。

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，有割記十五卷。（卷三至卷十七）

這些割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；其實最初只是爲自己記憶的幫助的，後來因爲我

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，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，請他代我收存。到了最後的三年（一九一四——一九一七），我自己的文學主張，思想演變，都寫成割記，用作一種「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」（thinking aloud）。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，就不肯寄給怡蓀，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。因此我對於這種割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，所以無論怎麼忙，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割記，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。

我從自己經驗裏得到一個道理，曾用英文寫出來：

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.

譯成中國話就是

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，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。

試舉一個例子。我們中國學生對於「儒教」大概都有一點認識。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，很模糊的。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「儒教是什麼」，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；你拿起筆來起草，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，必須查書，必須引用材料，必須追溯儒教演變的歷史。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，然後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揮出來，成爲一篇有條理的講演。你經過這一番「表現」或「發揮」（expression）之後，那些空泛的印象變着實了，模糊的認識變着清楚。

明白了，那些知識才可算是「你的」了。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「儒教是什麼」了。

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，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。它的方式有多種，讀書作提要，割記，寫信，談話，演說，作文，都有這種作用。割記是爲自己的了解的；談話，討論，寫信，是求一個朋友的了解的；演說，發表文章，是求一羣人的了解的。這都是「發揮」，都有幫助自己了解的功用。

因爲我相信割記有這種功用，所以我常用割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。有時我和朋友談論一個問題，或通信，或面談，我往往把談論的大概寫在割記裏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鈔在割記裏。有時候，我自己想一個問題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，步驟，結論，都寫出來，記在割記裏。例如我自己研究《詩三百篇》裏「言」字的文法，讀到「小雅·彤弓篇」的「受言囊之」「受言囊之」，始大悟「言」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，有「而」字的功用。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「爾」「汝」「吾」「我」等字，隨筆記出研究的結果，後來就用割記的材料，寫成我的「爾汝篇」和「吾我篇」。又如我的世界主義，非戰主義，不抵抗主義，文學革命的見解，宗教信仰的演變，都隨時記在割記裏，這些割記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。

我寫這一大段話，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爲什麼在百忙的學生生活裏那樣起勁寫割記。

自序